

編 者 按

本期「百年中國」有兩篇文章。

其一，樂正的文章深化了上期「上海城市研究專輯」討論的問題。作者不但以相當有說服力的歷史資料和統計數據，刻劃出以鴉片戰爭為轉折點，廣州的節節失落與上海的迅速崛起；還在分析造成這種巨大的發展落差的諸種因素（如，不同的歷史條件、貿易及租界制度、商業價值觀等）時，突出比較了廣州和上海分別代表的兩種截然不同的貿易體系和經濟制度。融入世界貿易體系的資本主義化的上海外貿體制，是對代表中國傳統農業帝國的、以「一口通商」和「公行制度」為條件的「廣州制度」的否定，反映了中國這獨立而半封閉的農業帝國，在開放過程中的歷史性轉變。

其二，毛丹以清理陳獨秀的民主思想產生及其思想資源為案例，指出由於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迫切追求富強的心態，使他們在接受西方民主觀念時，很難區分其制度層面和價值層面的問題；又容易誤將「民主」視為同「自由」一樣的基本價值，並賦予「民主」以道德價值和烏托邦色彩。這樣，中國知識分子就很自然地將德先生升格為德菩薩，製造出自己的「民主神話」。